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21

# 压力与自觉:经费视角下民国前期 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探究

李海萍<sup>1,2</sup>,上官知立<sup>2</sup>

(1.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民国教会大学的发展与其“中国化”进程相关,经费制度改革是这一进程的直接体现。民国教会大学经费决策的“中国化”经历了从外国差会掌控到国民政府参与监管的变革;经费来源的“中国化”经历了从单一差会供给到多元本土筹措的变革;经费支出改革则主要体现在教师薪酬方面,“中国化”表现为从“厚西薄中”到“同工同酬”。民国前期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的推动,既有来自经济、文化、政治的外部压力,也有其内部的自觉基础。这一历史进程可为当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教会大学;教会大学中国化;立案;经费体制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6-0158-12

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sup>①</sup>。民国初年,教会大学<sup>②</sup>初期“欲以学校为一种辅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sup>③</sup>，“以科学之矢,射宗教之的”<sup>④</sup>,建立一种“适合于基督教的社会及中国人民需要之特种教育”<sup>⑤</sup>。然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只有从政治、文化和情感上自觉尊重中国,才可能获得民众的接纳并得以长期发展。民国时期教会大学一些有识之士率先推动“中国化”进程,但迫于经济、文化、政治压力而被动“中国化”者亦不在少数。就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终究走上了“中国化”道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⑥</sup>,也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教育之发展,必赖有大宗经费以济其用。”<sup>⑦</sup>

经费是教会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直接体现。本文主要从经费角度出发,对民国前期<sup>⑧</sup>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进程进行梳理,以期从另一角度还原早期教会大学办学之复杂与艰辛,及其主动适应中国社会以谋办学之成功的系列举措,或可为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多角度的参考与借鉴。

## 一 民国前期教会大学经费决策的 “中国化”:从外国差会掌控到国民政府参与监管

教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社会机构,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与敏感。民国初期,教会学校蓬勃发展。据1917年统计显示,教会大

收稿日期:2022-06-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OA190038)

作者简介:李海萍(1976—),男,湖南邵东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

①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本文所指教会大学,是所有由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学校。

③《基督教教育事业》,载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⑤《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载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⑥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10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⑦《全国教育计划书(1919年3月)》,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⑧因为战乱时期的教育只是教育史上的非常态部分,本文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将研究的视野主要聚焦于民国前期(1912—1937年),这对我们更具借鉴意义。

学学生数占国人自办高等学校学生数的 80%<sup>①</sup>。至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快速发展,教会大学招生比例有所下降,16 所被公认为高等学校的教会学校(13 所基督教学校、3 所天主教学校)招收了占全国大学生总数 10% 到 15% 的学生<sup>②</sup>,但整体学术声望日显,其中不乏高水平甚至世界知名的大学。除此之外,还有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办学规模较小的铭贤学院、求精商学院等教会大学。另外,一些大学与教会关系千丝万缕,但严格说来并非教会所辖,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经 1952—1953 年的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与其他公立、私立大学合并,校名全部取消。

1927 年 12 月,南京政府公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sup>③</sup>。此后,教会大学陆续立案。从经费体制看,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可以此为界,分为“前立案”和“立案”两个阶段。立案之前,教会大学完全自治;立案之后,则被纳入私立大学体系,接受国民政府约束。

#### (一)“前立案”阶段的经费决策:外国差会掌控

北京政府时期,尽管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此伏彼起,有关教会大学立案的政策频出,但因国内政局动荡、中央权力式微,政府有心无力,教会大学基本处于完全自治状态。教会大学一般由差会负责,从教会大学隶属关系来看,可分为独立办学与联合办学两种。如图 1 所示,一些教会大学为差会单独创办,更多则经历了从差会独立创办到多个差会联合办学的演变过程,二者的经费决策体制自然存在差异。差会拨款是教会大学创办初期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如齐鲁大学的雏形——登州文会馆的资金几乎全部由差会拨给。早期的教会大学不收学费,甚至提供免费住宿和津贴,学校

规模不大,经费决策体制较为简单,多为由上而下的单线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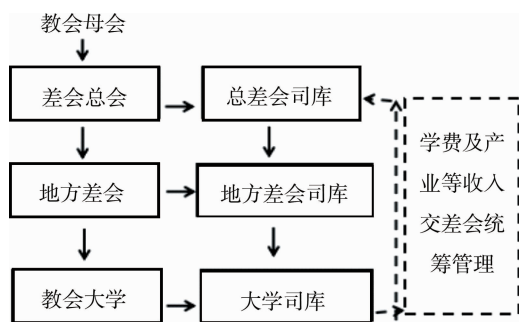


图 1 差会独立办学财务管理

独立办学多见于教会大学发展初期,这时学校课程有限、设备简易、所需开支较少,在经济上尚无太大负担。但一旦真正发展起来却发现教会大学耗资颇巨,一般单个差会难以承担。“在华之基督教会众多,若分力经营教育,则财力各形单薄,故势必须联合。”<sup>④</sup>遂教会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出资,成立托事部统一管理大学(见图 2)。如齐鲁大学最初由美国北长老会独办,后发展为与英国浸礼会合办。“在美之托事部授权在华之董事会处置一切校务,惟经济预算、选聘校长及教授,必须得托事部之最后同意。”<sup>⑤</sup>在实际工作中托事部和董事会责任逐渐明确,“托事部的专是募集资金并进行投资,用它们来为几个部门谋取最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董事会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资金,但托事部有权撤回经费<sup>⑥</sup>。虽然联合办学比单独办学只多了“托事部”一个环节,却多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博弈过程。联合办学的教会大学通常都有多轮协商后形成的书面协议,规定各参与差会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如在齐鲁大学联合办学初期,美国北长老会、英国浸礼会就对董事会组成人员配额、选举权、教师派遣、学校财

①陈叔达译:《欧美人在中国之教育的设施(1921年)》,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77 页。

②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 页。

③早在 1926 年 10 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因“按之事实,专门以上学校其立案原当从严;中等以下学校其立案不妨略宽。若适用同一之规程,则实施上反形窒碍”。(《大学院布告第五号(1927 年 12 月 20 日)》)故在大学院时期,对这些规章进行了修订,1927 年 12 月公布了《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1928 年 2 月公布了《私立学校条例》《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后,将前颁之私立学校规程、条例加以合并,修订为 1929 年 8 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

④陈叔达译:《欧美人在中国之教育的设施(1921年)》,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85 页。

⑤刘廷芳:《教会大学办学之困难》,《教育季刊》1939 年第 3 期。

⑥艾德敷:《燕京大学》,刘天路译,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产所有权细则、维修费、保养费、职员住宿、常规经费供给等进行了多次磋商方达成协议,后随着多个教会相继加入,其细则更为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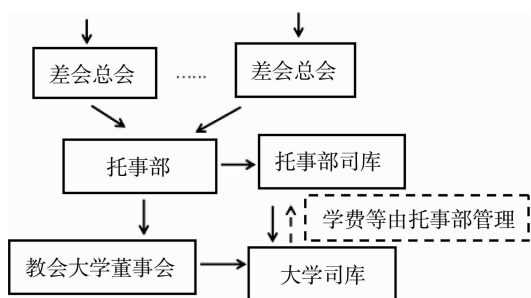


图2 差会联合办学财务管理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教会大学的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须经过差会,教会大学司库从来都是外国人担任,“校长多要仰承其鼻息”<sup>①</sup>,大学的一般开支均须经过差会董事会同意,以至于行政人员抱怨:未经西方的批准,连买一盒粉笔也是困难的<sup>②</sup>。而且差会往往把“拥有信徒人数的多少”作为判断标准。这种教会大学和差会间的割裂严重“阻碍着希望提高学校学术水平所作的努力”<sup>③</sup>。

## (二)“立案”阶段的经费决策:政府参与监管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和高度文化自尊的国度”。教会大学僭越中国教育主权的“独立性”,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必然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民国前期,民族情绪高涨,收回教育权运动风起云涌,几经波折与博弈后教会大学立案终

成大势。教会大学立案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否则在政局如此跌宕不稳之际历届政府也不会不约而同对这一事务扭住不放,就连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也在短暂的执政期间相继出台了多项有关教会大学的政策。盖因其时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收回教育权是主要倡议之一,政府愈是孱弱愈要重视民意,况且政府中也确有不少复兴中华之仁人志士,在列强林立之际教会大学可能是最具影响力且又最容易着手之“软柿子”。教会大学虽内部分歧严重,但亦逐步从最初的强硬反对发展到最终达成认真配合政府的共识。

在民国前期教会大学立案政策中,直接关乎教会大学经费问题的政策条款只见于1927年12月出台的《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它要求私立大学、专门学校呈请立案“必须试办三年以上”且在“经费、设备、教职员”三方面具有相应资格,并开具事项清单。但深究其理,关于教会大学立案政策的任何重大举措无一不在经费问题上有所体现。如立案“六条”中的“校长须为中国人”、校董会中“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之规定,导致教会大学的校长们普遍对教会“权力重心”转移后经费供给的来源与稳定表示担忧。由于教会大学立案后作为私立大学统一归口政府管理,其经费决策体制也必然依照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发生变化,即由原来的外国差会掌控变为政府参与监管(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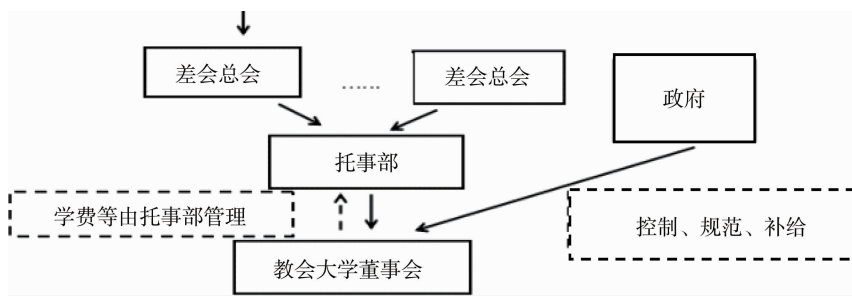


图3 教会大学立案后的经费决策体制

教会大学陆续立案之后,其顾虑之事依旧未能完全解决,但并未形成大的阻碍,之后教会大学

一路向前,在民国大学的“黄金十年”中与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一同蓬勃发展,成就蔚然可观。截至

①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辑)》,1988年版,第105页。

②刘家峰:《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载章开沅,马敏:《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③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钰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1938年,基督教大学数量、学生数量在全国占比均约为12%,而其设备、经费、图书皆远超此比例,可知“基督教大学在设备、经费、图书上皆占优势”<sup>①</sup>。

## 二 民国前期教会大学经费来源的“中国化”:从单一差会供给到多元本土筹措

民国初期,教会大学规模较小、结构简单,所需经费较少,外国差会完全能够支撑。但随着国内外经济、文化、政治形势的变化,外国差会的经济来源逐渐不稳,支持能力与意愿大大削弱,加之教会大学立案政策的实施,经费筹措的“中国化”势在必行。

### (一) 早期单一的差会供给

在民国初期,教会大学因其隶属关系的复杂性,每一所都有其特殊之处,经费来源更是各有千秋,但差会供给对大多数教会大学而言是最主要、最稳定的经费来源。差会除以拨款方式支持教会大学外,还常常直接派遣人员到校,其薪金由派遣差会负责。这部分资金不列入预算,也很少在财务报表中列出,但数目经常是拨款数的二至三倍。如布道部派遣到圣约翰大学的24名西籍教员,其薪金在1928—1929年度达181 014.00元<sup>②</sup>,逐年累积,自是一笔巨款。

差会拨款是早期教会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差会也是其资金的管理者。美国北长老会海外宣教部制定的传教手册规定:“差会司库是分配海外宣教部拨给各差会经费的代理机构,它对海外宣教部的司库负责。”<sup>③</sup>同样,教会大学的各种收入如学费、募捐、资产收入等都要上缴海外宣教部司库统一管理。也就是说,教会大学不仅经费决策权在差会,连财务会计等业务都主要由差会负责。

### (二) 逐渐多元的本土筹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经济陷于停顿,直接影响了教会大学的筹款;加之20世纪20年

代,亚非拉地区民族运动兴起,西方对捐资海外办学的积极性趋冷,而教会大学耗资甚巨,资金筹措常常成为教会大学最为紧要之事。以1917年的岭南大学为例,因“一战”缘故,教会所获经费仅为往年的六分之一,来自美方的拨款仅占学校收入的8%。为此,教会大学的经费筹措不得不逐步由单一的差会拨款走向多元化、本土化,其主要渠道包括学费收缴、社会捐赠、资产经营以及颇具政治意味的政府补助等。

#### 1. 学费收缴

教会大学办学之初,不仅不收学费,还提供免费食宿。1905年后,大部分教会大学开始实行收费制<sup>④</sup>。民国初期的公立大学学费标准基本统一,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学费标准由各校自行确定。在20世纪30年代,公立大学学费最低,每年为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教会大学学费最高,每年为160银圆左右;私立大学介于两者之间,每年为45—120银圆<sup>⑤</sup>。同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如东部地区的教会大学大多收取高额学费,享受学费减免待遇的学生比例极低,学费占学校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收入<sup>⑥</sup>。学费所占比重仅次于差会拨款,成为教会大学的重要常规收入,教会大学经费本土化走出重要一步。

#### 2. 社会捐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显示,1930年教会大学中岁入捐助款项最高者是岭南大学,数额为489 583元,占其年度总岁入经费的56.08%。其次是齐鲁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之江大学和华中大学,岁入捐助款项分别为310 250元、300 648元、283 810元、179 372元和179 085元,分别占其年度总岁入经费的77.27%、60.64%、72.07%、66.20%和88.92%<sup>⑦</sup>。许多教会大学设立校董会、校友会、募款委员会等机构,其成员包括官僚政客、工商巨子、教育文化界名人等,以争取政府、实业界的经济支持;此外,校友、私人捐助也是教会大学经费筹措的重要来源。在立案之后,

①谭天凯:《基督教大学在吾国高等教育中之地位》,《教育季刊》1938年第4期。

②徐以骅,韩信昌:《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③王妍红:《美国北长老会与晚清山东社会(1861—1911)》,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60页。

⑤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载陈远:《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52页。

⑥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⑦《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 教育概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7—140页。

由于被纳入私立大学之列,教会大学获得捐助的渠道和数额愈益增多。除直接的资金捐赠外,图书资料、仪器、房产、农田等也是重要的捐赠内容。

### 3. 资产经营

为拓展更为充足的资金来源,教会大学还结合现代理念进行资产经营,积极创办工厂、农场等产业。如岭南大学的经营收入主要来自校办企业、农场林场、合资企业、校产租赁等:校办企业主要有食品公司、日用品公司、蚕丝厂等;购置农场林场,农林收入颇丰;参股方式合办公司等;通过出租住宅、学生膳堂、商铺、田土等方式进行校产租赁<sup>①</sup>。

### 4. 政府补助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虽然出台了教会大学立案政策,但由于推进无力,实际上对教会大学仍“放任自流”“漠视不理”。教会大学虽然建在本土,但自成体系,享有“治外法权”,同时也不享受来自政府的任何拨款、资助与奖励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力推教会大学立案,教会大学逐步成为私立大学的一部分,少数大学开始得到政府补助。1933—1934年间,七所基督教大学共得到国民政府10万元资助。其中金陵大学携地域之便,是得到政府资助最多的教会大学。当然,教会大学对来自政府的资金的看重也多因其代表中国官方的接纳与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大学经费本土化的情形各异,如:岭南大学本土化高达8成以上,而燕京大学1917—1918年度的预算为3.5万美元,其中87%来自教会,到1936—1937年度预算已达21.5万美元,其中14%来自教会、55%来自美国的私人捐款、10%来自中国的私人或官方<sup>②</sup>。从经费来源看,虽然本土资源不同,但来源于差会的比例都在明显减少。

## 三 民国前期教会大学经费支出的“中国化”:从“厚西薄中”到“同工同酬”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经费支出主要包括基建投入、日常开支以及教师薪酬等,资金方面较一般

私立大学普遍更为宽裕,在基建投入和日常开支方面也较为充裕。但就经费支出变革来说,其他方面无显著变化,唯有教师薪酬制度出现了结构性改革。

### (一)“厚西薄中”的薪酬政策

在教会大学初期,教职员的薪水不论国籍都由其所属差会支付。因此,就教职员的认同来说,他们认为自己首先属于差会,其次才属于教会大学,他们考虑各自差会的利益要高于教会大学利益。教会大学因是外籍人士主理,从经费支出来看,最大的问题当为“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对此中国籍教员和管理者均“敢怒不敢言”。在教会大学初期,差会宁可派遣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也不愿意资助中国教员,尽管当时一个传教士一年的花费大约为3000元,而聘任一个中国教师的费用仅在150元—240元之间<sup>③</sup>。

当时,外国教师薪酬远高于中国教师,有西方留学背景的教师薪酬远高于未曾留学的中国教师,即使与国内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同类教师的薪酬相比,教会大学中国籍教师的薪酬也远不能及。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大学教员薪俸表》明确规定了教员薪俸应一视同仁,但该政策并未得到教会大学的真正重视和认真执行,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的教师待遇相差十分悬殊。沪江大学中国教职员的待遇不超过美籍教员的1/4<sup>④</sup>;东吴大学则将教师分组,其中中国教师单做一组,该组教师只能担任讲师或助教,极难获得职位提升,他们的薪水远低于同类公立大学教师之标准。

### (二)“同工同酬”的经费改革

圣约翰大学所属布道部劳雅德针对校长卜舛济提出的“那些从美国大学毕业并到本校任教的华人,当然除了他们因家在中国不需任何回国休假的费用外,应得到与美国教员相同的待遇”,称实在想不出“如果问题涉及支付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的工资,美国教会将如何来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籍教员的薪水之低,甚至“按照中国标准也显得寒酸”,而在国立大学则能拿到与外籍教师同样标准的薪水。柏尔根在比较传教士教师与中

<sup>①</sup>徐天舒:《岭南大学经费研究(1888—1937)》,暨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sup>②</sup>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sup>③</sup>刘家峰:《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载章开沅、马敏:《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sup>④</sup>谭双泉:《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国教师的地位时曾经指出:“由于我们掌握着经济大权……我们不可避免地变得独裁甚至专横。”<sup>①</sup>1926年,布道部终于批准圣约翰大学任用的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可以获得美国教员同等工资,但条件是差会、大学各负担一半,而其他中国教员仍只能接受大大低于美国教员和受过美式教育中国教员的待遇<sup>②</sup>。

燕京大学针对中外籍教师待遇不平等情况,以国民政府的大学教员薪酬表为标准率先加以改革,在教会大学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与引导作用。1922年,燕大即开始实行中西教职员均等薪酬制度;1929年,司徒雷登又主持制订了《燕大中国教职员待遇细则》,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与外籍教授享有同等待遇<sup>③</sup>，“标准谨严,开全国基督教大学先声”<sup>④</sup>。又如:1931年,华南女大的外籍传教士平均月薪约为中国教师的3倍;1934年,华南女大修订教师薪俸标准,反向降低外籍教师薪金,无论级别薪俸一律为160元<sup>⑤</sup>。这虽与政府规定不相符合,但其中外教师薪酬平等的举措值得认可。

#### 四 民国前期教会大学“中国化”之归因:“压力”“自觉”的双重影响

民国前期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进程既源于其情非得已的外部压力,也归功于部分教育家和虔诚信徒的自觉推动。总体来看,应当是外部压力加速了这一进程,直接原因就是经济、文化与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以及这三者互为因果形成的合力。

##### (一) 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多重压力

民国初期的教会大学经历了中国政治最为复杂跌宕的时代。1912年民国初建即遭袁世凯篡权,待其复辟失败,皖系、直系、奉系军阀轮番执政,中央政权频繁交替,地方更是派系林立、军阀

割据,内政不修、民心不安。1927年北伐胜利后,宁汉合流、东北易帜,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国才进入短暂的平稳时期。然而对于教会大学来说,世界局势动荡依旧剧烈,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二战”,都未给世界喘息之机,教会大学亦被冲击,其首先反映在经济方面。

##### 1. 经济压力:国际国内叠加

“学堂成立,筹款最要。”<sup>⑥</sup>杜佐周1926年指出,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有“三种大障碍:一是经费的支绌;二是人才的短少;三是书籍、仪器及设备等的缺乏”<sup>⑦</sup>。而后两大障碍其实都可通过经费问题得到缓解。为使“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sup>⑧</sup>,大学校长经常“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反”,导致时人竟有“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之感叹<sup>⑨</sup>!

受国外局势动荡以及经济危机影响,差会拨款极不稳定。1933年,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社会捐赠能力骤减,各合作差会的财政状况均不容乐观,教会大学来自差会的拨款减少。如:美国圣公会被迫缩减了对华中大学的拨款,并停止支付中文系一个系主任职位的薪金;雅礼会原负责向华中大学理学院提供教师薪水,但随着各系教师需求大增,雅礼会不得不将整个经费预算用来支付教职工薪水而砍掉了仪器、书籍、报刊等的购置费<sup>⑩</sup>。

除经费来源外,教会内部的理念差异也限制了教会大学的发展。早期传教士大多认为,“职业教育是世俗的,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会有什么用处,教会学校用差会的钱来培养工程师、农业家、律师等等是毫无理由的”<sup>⑪</sup>。如山东差会的倪维思、韦丰年创办果园、丝厂,实行“实业办

①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②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8页。

③《燕大中国教职员待遇细则》,《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9年第1期。

④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6页。

⑤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⑥郭大松、杜学霞:《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⑦杜佐周:《高等教育与国家前途:在武昌私立中华大学讲演》,《教育杂志》1926年第9期。

⑧《湖南姚(洪业)烈士遗书》,载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0页。

⑨《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1930年)》,载张寿镛:《约圆著作选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0页。

⑩柯约翰:《华中大学》,马敏、叶桦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5页。

⑪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教”,“缓解寄宿学校压力,使男孩学会自力更生”,在增加学校收入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机会,但海外宣教部对此并不赞成,建议“停止建造”,盖因“或有人言,天国是清洁之所,教会乃良善之区,岂可容玛门之神座在内陈列。钱财二字乃污秽名词……圣徒归向基督,总应祈祷为心,以得救为怀,不可稍有世界想介于其心,以乱本根”<sup>①</sup>。再如岭南大学,海外宣教部对地方差会的干涉和对办学的误解,引起岭南大学的不满。在“一战”危机导致差会拨款骤减后,岭南大学为求生存不得不转向本地资源。在政府与实业界有识之士扶助之下,岭南大学不但渡过了难关,还获得了大发展的契机。教会大学经费来源的本土化倾向对教会大学的经费决策有较大影响,虽然不能解构差会的权威,但中国籍管理者的话语权迅速提升。

## 2. 文化压力: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大学“为泰西教士所创设,得泰西捐款以济之,恃泰西和约以护之”<sup>②</sup>,“根在外国、权在教会、西人为主、外国方式”。其矛盾除了大学通常的学术权力与政府权力、市场权力之争外,还存在强烈的文化冲突与中西对立。教会大学的教育方针是宗教第一、教育第二,学生熟知西方的风俗习惯、名人轶事,却不甚了解本国历史和文字。如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经常被批评是“汉语和文化的‘文盲’”<sup>③</sup>。经费作为最敏感、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不仅受到大学文化生态的制约,也最易体现大学的文化倾向。如在1925—1926年间,教会大学共有教师465人,其中中国人只有181人,外籍教师占主导地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教会大学,必然聘请更多的外籍教师,花费更多的教育经费,如此亦必然提高学生学费,挤压中籍教师经济权益甚至挤占其他教学资源。

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爆发,教会大学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在民间有着广泛影响和获得巨大支持的运动效果卓著,不

仅推动政府出手对教会大学进行规范,也使得教会大学的组织建构与办学理念不断向“中国化”“本土化”发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教师比例的增加。1923年,中外教师人数大体相等;1932年,中外教师之比为2:1;1936年,更是达到4:1<sup>④</sup>。师资结构在比例上的变化,导致经济决策方面的话语权也慢慢转移,“到1936—1937年度,许多决策开始由当地的理事会作出。同时,随着中国人担任大多数的行政职务以及中国教师占80%时,差会的家长式作风也多少有些减弱”<sup>⑤</sup>,教会大学的文化风尚也越来越“中国化”。

## 3. 政治压力:逐渐强硬的立案政策

与清政府的“鸵鸟”政策相比,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学校的态度已有很大转变,即已准备承认那些符合要求的教会大学,但严格限制其宗教教育。1917年起,北洋政府颁布多项政策,督促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立案。由于民意沸腾,政府逐渐强硬,开始以立法的形式督促教会大学立案。南京政府成立后,对教会大学立案益发重视,政策更为细致,手段愈加强硬。1924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10届年会提出将教会大学收回的具体办法,其中,对经费的直接规定有“外人所设学校征收学费,须遵照我国部颁学费条例之规定,不得超过所在省区私立学校所收之数额”<sup>⑥</sup>。

对于立案政策,少数教会大学主动配合,但更多的是观望和拖延。如震旦校方最初就是等待观望,“校院长对此项通令,视之漠然,以为官样文章”。然后,企图与政府讨价还价,以求得最为有利之方案。为此,教育部答复:“查国内美教会所立各大学,大都遵奉我国现行教育法令,呈经本部批准立案,该震旦大学自可依照上项办法办理,以免歧异。”<sup>⑦</sup>最终,在各种压力下,震旦大学提交了立案申请,并于1932年冬被准予立案。其他教会大学也在利弊权衡之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完成立案。

唯有圣约翰大学例外,这从其校名也可见一

①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广学会1940年版,第289页。

②《基督教高等教育之起源与情况》,载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③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④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⑤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概略》,《教育杂志》1924年第12期。

⑦《为上海震旦大学可依照美教会所立各校办法呈请本部立案附送法规三种请查照转致由》,《教育部公报》1931年第23期。

二,圣约翰大学是唯一一所不按中文传统命名的教会大学。该校的理由是“屈服将意味着牺牲教会学校的根本特色,因此,他们认为决不应该妥协”<sup>①</sup>。最开始圣约翰大学对立案完全不屑一顾,但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的教会大学陆续完成注册之后,圣约翰大学的处境十分尴尬,在华人员的态度开始转变,卜舫济认为大学不应强硬拒绝,在是否“宣布申请立案上”手段应“有所调整”。但主导圣约翰大学立案的不是校长卜舫济,而是美国圣公会负责人伍德。美国方面的态度非常鲜明,认为国民党要镇压基督教,其厄运不可避免,因而坚决反对立案。几番拉锯之下,直到1947年,它才成为中国合法的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的立案,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其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为教会大学缓解资金压力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在1934—1935年度,教育部分配给私立大学的72万元中教会大学占将近一半,而且这笔经费主要用于职业和科学教育。这些资助甚至逐渐成了年度拨款,教会大学开始把它列入每年的预算;中央和省级政府也为森林、养蚕、牙科和微生物学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奖学金<sup>②</sup>。当然,这种对教会大学的资助,其实也是政府控制教会大学的一种手段,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sup>③</sup>,其意图是使教会大学的发展面向国家需求。如金陵大学1930—1936年从中国方面得到的近30万补助款就“都有特别用途,并非一般预算”,其中1934年安徽、广西、湖北、湖南四省农业银行给金陵大学农学院的10万元更是专门规定用于市场条件、租佃关系和土壤墒情的调查<sup>④</sup>。丰富的本土化经费来源意味着教会大学的中国化倾向。教会大学从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所获款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会大学逐步被社会各界认可。这既是

教会大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 (二)教会大学兴教办学的行动自觉

教会大学在华兴教办学,“目的当然是为了‘(教)化中国’,亦即是使中国‘基督(教)化’,但结果更为明显的却是自身的‘中国化’”<sup>⑤</sup>。这种“中国化”的转变大多源于外界压力,但也有其自觉的基础,这样才可能让外部压力成功转化为自觉能动的实际行动。

### 1.由“借学布道”转向“传道授业”

“借学布道”既是教会大学“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sup>⑥</sup>。随着教会教育理念的转变,为确保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教会大学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教会大学进入了重新确立自身角色的时期,即从以宗教教育和传教为直接功能向以中国的现代化教育为直接功能的转换<sup>⑦</sup>。

### (1)办学目标的转变

教会大学与中国政府的分歧最主要体现为教育宗旨的不同,尽管阻力颇大,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仍能得以发展。其原因在于,教会大学与国民政府都有办好大学的主观意愿,也都有为社会培养人才的积极诉求。对华人校长来说,努力在“基督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求平衡,这无疑是对智慧的考验。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开始“谈论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基督教精神”“以中国化和为中国服务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sup>⑧</sup>。如司徒雷登将办学宗旨改为“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智、道德、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为宗旨”<sup>⑨</sup>,金陵大学将办学宗旨改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sup>⑩</sup>等。

① 賚玛丽:《圣约翰大学》,王东波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②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288页。

③ 蒋宝麟:《金陵大学的经费来源与运作研究(1910—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⑤ 吴梓明:《基督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章序第3页。

⑥ 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⑦ 刘家峰:《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载章开沅、马敏:《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⑧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97页。

⑨ 《私立燕京大学组织大纲(1934年)》,载吴惠龄、李壑:《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 近现代部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⑩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陈远:《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还有一些教会大学用博爱、牺牲、平等、服务等字眼代替基督教义,在办学宗旨上处理得更加高明,以获得教会、政府双方的认可,如沪江大学“以继续其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人格、造就专门人才、研究高等学术、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sup>①</sup>。上述办学宗旨的变化也说明教会大学逐渐从重形式到重精神的熏陶,日益“中国化”“世俗化”。到1929年,大部分教会大学已经不再硬性规定宗教崇拜和宗教课程,教育成了学校的主要目的,传播福音在政府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sup>②</sup>,宗教宣传活动由“粗俗的宗教形态”逐渐转变为“有修养的哲学形态”<sup>③</sup>。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sup>④</sup>刘廷芳则强调:“我信宗教,我信教育,我信两者能并行不悖。我信两者能互助,则收益更大。”<sup>⑤</sup>卜舛济进一步指出“有效的教育事工必须作为有效的教会事工的基础”,而且教育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他也认为教会大学宗教和教育的双重目标不仅并行不悖,而且互为补充<sup>⑥</sup>。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教会大学的“外来性逐渐消退、中国特征得到认可,前景十分乐观”<sup>⑦</sup>。除圣约翰大学外的所有教会大学均向中国政府注册,作为私立大学接受中国政府管理。同时,教会大学对政府资助的接受也标志着里程碑式的转变:一方面说明中西双方都愿意教会大学成为中国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示政府对教会大学的认可<sup>⑧</sup>。

## (2) 经费决策权的部分转移

财权决定事权,经费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校由谁管理、学校发展方向由谁决定。“自主与自立是密切相关的。”<sup>⑨</sup>自立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西方教会的政策有时被称为“不出钱就不给权”,郭斐蔚主教曾写道:“只要母会仍送人送钱来华,教会就不能把使用差会财产和经费的最后决定权移交给任何其他的人。”<sup>⑩</sup>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进程也与经费来源的“中国化”密切相关,二者相互依存也相互制约。一直以来,差会反对把大量经费用于教育而不是直接用于福音传播,在教会大学向政府立案后,差会认为教会大学既然已经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中国人迫切要求享有大学自主权,那么首先就要做到经济自立。在1929—1937年间,教会大学比较成功地扩大了来自中国的经费比例,其在总收入中占比从24%提高到53%<sup>⑪</sup>,中国人对教会大学财政的影响逐渐增大。

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最实质的就是学校管理的“中国化”<sup>⑫</sup>。按照立案要求,教会大学校长应让位于华人,校董会成员也应有三分之二为华人。但“接收困难,不在人材,而在经济。一俟经济方面筹划妥当,即正式允许辞职,收归华人办理云”<sup>⑬</sup>。当时的“这种制度,即差会董事会提供大学经费资助的份额,最通常的是采用提供西籍人员的方式”<sup>⑭</sup>,教会大学因受“经济问题”掣肘,长期“延宕不决”。教会史学家王治心曾评论说:“西人中的开明人士,他们的地位虽然改变,然皆乐于帮助,认此举于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会教育终必由中国人自己起来负责,现在时机已到,毋

①黄瑶:《华人掌校与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以刘湛恩执治沪江大学为例》,《长江文明》2018年第4期。

②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248页。

③吕达:《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④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刘敬坤、叶宗馥、曾景忠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7页。

⑤刘廷芳:《我对于基督教在中国教育事业的信条》,《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5年第1期。

⑥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4页。

⑦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69页。

⑧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页。

⑨刘家峰:《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载章开沅、马敏:《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⑩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⑪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

⑫赵飞飞:《论民国时期基督教教会大学立案中的校长人选问题》,《近代史学刊》2015年第2期。

⑬《金陵大学当局总辞职》,《申报》1926年7月5日第011版。

⑭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8页。

庸推诿。”<sup>①</sup>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也说到他的目标是“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让人们仅仅在谈到其历史的时候,才想起它的西方渊源来”<sup>②</sup>。

## 2.“入乡随俗”与“自给自养”

毋庸讳言,部分差会和教会大学确是带着文化优越感进入中国,但真正愿意遵循基督教教义教导——“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真正愿意扎根中国、服务大众的办学,就应当放下这种傲慢,入乡随俗,尊重当地文化与当地民众,这样才能被真正接纳与认可。

### (1)“入乡随俗”:形式上的“中国化”

形式上的“中国化”首先表现在语言上的尊重,如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潞河书院”在起步时就提倡只使用汉语教学,努力建立“以民族自尊为方向的教育体系”<sup>③</sup>,虽然本土语言教学进展不顺,但其初心却难能可贵。“入乡随俗”还可从教会大学的校名一窥端倪:如金陵大学以南京古名金陵命名,东吴大学以苏州古名东吴命名。而从打着西方宗教烙印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到散发出浓郁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气息的“齐鲁大学”,则意味着在校名改变、话语转换的背后完成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变革<sup>④</sup>。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仅有圣约翰大学是西文风格,其在对待中国文化、中国师生以及立案问题上的态度也最为强硬,其他教会大学则一直在努力融入中国社会,力求打造更具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

形式上的“中国化”不仅表现为校名的斟酌,而且校园建筑也极具中国特色。教会大学的建筑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实际介入方式”,亦是“一种偏重于文化意义并急于得到社会之认同

的建筑形式”<sup>⑤</sup>。为拉近与中国民众心灵之间的距离,教会大学在校园建筑方面注重采用“以中国传统古典建筑为主要构图的中西合璧式”<sup>⑥</sup>,被誉为“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起点”<sup>⑦</sup>,如:燕京大学“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sup>⑧</sup>;华西协和大建筑则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与建筑的精髓,中西结合是建筑设计的出发点,不愧是一个“协和”的大学和“协和”的建筑群<sup>⑨</sup>。

“五四”运动后,为了推动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发展,19世纪20年代初中国教育调查团发表的报告书对中国基督教教育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三项建议。其中,所谓“更中国化”,就是指“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彻底地中国化”<sup>⑩</sup>，“基督教精神应该渗透到教会大学工作的各个领域中去”<sup>⑪</sup>。

### (2)自给自养:自立才能自主

教会大学创办初期,办学经费多由差会提供,由此差会及其母会行使对教会大学的管辖权也是理所当然。但无论是教会还是其所属教会大学,只有扎根本土、自给自养才是长久之计,这也是教会在世界各地发展的通例。随着教会学校声望日显、教会扎根本土日深,教会学校自养已能部分实现。如斯比尔在考察报告中指出:“学生或家长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中国人支付学费,他们将进一步意识到教育的意义;所有人必须根据能力支付部分费用;实现学校自养应有一定的计划,并开诚布公地同家长协商。”<sup>⑫</sup>在推动教会自给自养的同时,中国教会的自立意识也逐步提高。特别是随着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增加,中国教会领袖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大力推动教会自立,“学校的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22页。

②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③艾德敷:《燕京大学》,刘天路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④刘家峰:《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载章开沅、马敏:《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⑤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⑥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意义》,载章开沅:《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⑦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⑧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⑨邬大光:《中秋时分赏华西:坝上的大学》,《现代大学教育》2020年第1期。

⑩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349页。

⑪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⑫参见王妍红:《美国北长老会与晚清山东社会(1861—1911)》,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自养时代已经到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大学来自中国的收入逐年增加,从1925年只占大学预算的1/10,到1937年达到最高峰(超过50%)<sup>①</sup>。

3. 从“自发”到“自觉”:在“基督化”“中国化”之间平衡

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对所属学校从未放松控制。教会办学的初衷是“借学布道”,传教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教义的“纯正”,因此对教会大学这一意识形态最多元、最冲突之处,更是牢牢把握、从不放松;所以即使在教会大学立案后,校长、董事长多由中国人担任并规定董事会成员一半是中国人,也并未动摇差会对教会大学的实际掌控。金陵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陈裕光曾说:“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sup>②</sup>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职务当时中文称“教务长”,但英文仍为“President”;而吴雷川的职务当时英文称“Chancellor”,在英语中意为“名誉校长”,其并不负责校政。根据《私立燕京大学校董会会章附则》第四条之规定,校董会选任教务长“必须经驻美之托事部认可后方为有效”,且“校董会应与教务长分担责任,协同维护本校之一切动产及不动产。校董会并经由教务长对托事部负责,保管及支配由托事部拨来之一切款项”<sup>③</sup>。华西协合大学则采用燕京“校长—教务长”模式,其教务长一职本非教育部规定,“实因本校系私立,创设人即托事部多在外洋,教务长即其代表也,又因本地校董会负本校进行之全责,故教务长者即为托事部与校董会二者之联络也”<sup>④</sup>,由此可见,教会大学的教务长在行政方面具有相当权责,尤

其在财政方面负有全权责任。

随着教会大学陆续立案,教会中的开明之士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与政府关系明显改善,但二者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依旧存在,只是在不断磨合、不破底线中确保教会大学办学顺利进行。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进程虽然缓慢,但一直在稳步推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教会大学“已取得真正的公民身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⑤</sup>。正如许多传教士经历了从“传道士”到“教育家”的角色转变一样,教会大学不由自主地经历了从传教机构到教育机构的转变,结果“手段变成了目的,或次要目的变成了主要目的”,“工具造成了,用工具的教会倒被削弱了”<sup>⑥</sup>。

### 结语

《大公报》1934年曾在社评中指出,教会大学“大体上已经失去宣教的气味”,且其“规律严谨,教员认真,学生勤学”<sup>⑦</sup>。教会大学竭力研究“中国之宗教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与教育上之需要”,力求“经济的、有效的办理”<sup>⑧</sup>。教会大学书写了中国大学史上虽然短暂却辉煌的一段历史,其办学成功与失利之处都值得重新审视。其“历史之所以有启发性,正是因为教会大学曾与一个民族吸收一种文化的过程具有密切的关系”<sup>⑨</sup>。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教会大学在客观上“完成了双重使命”<sup>⑩</sup>:一是“破坏的使命”,即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二是“重建的使命”,即为本土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提供了示范和借鉴。教育具有文化传承作用,渗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价值,与其民族背景、历史文化联系密切<sup>⑪</sup>。文化社会学认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均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总是“根据自

① 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页。

②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陈远:《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③ 《私立燕京大学校董会会章附则(附录四)》,《燕大友声》1937年第4期。

④ 张丽萍:《中国基督教大学从外国式到“中国化”的转折及其启示——华西协合大学从异质到本土身份的递进》,《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

⑤ 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⑥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⑦ 《燕大募款与教会教育》,《大公报(天津)》1934年5月7日第002版。

⑧ 《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⑨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⑩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⑪ 姜勇,柳佳炜:《论教育研究的中国道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己的‘经验世界’,重新理解这种文化的意义”<sup>①</sup>。

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国际化的过程,西方越来越多的高校在中国办学或合作办学,其健康发展亟须在制度建设、内涵发展以及监管体系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规范和提升,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避免短期套利行为,着力防控意识形态风险,确保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这些高校若要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不仅要有中国

立场、中国力量,而且还要有中国眼光,同时也需积极贯彻落实政府政策法规,深刻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土需求,思索如何将国际教育改革的“现代性”完美“嫁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根”之上<sup>②</sup>,放下傲慢之优越感或急功近利之心,以诚挚的办学态度与优良的教学质量获得接纳与认可。

## Pressure and Self-Consciousness: O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Church Univers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ding

LI Hai-ping<sup>1,2</sup> & SHANGGUAN Zhi-li<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urch universit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related to its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funding system was a direct embodiment of this process.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funding decisions of the church universit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be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foreign missions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supervision, while the sinicization of funding sources had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a single supply of missions to a plurality of local financing. The reform of funding expenditures was mainly in terms of teachers' salaries, whose sinicization was manifested by the change from “well-paid westerners but poorly-paid Chinese” to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church univers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from not only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but also the internal conscious foundatio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can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day.

**Key words:** church university; sinicization of church universities; registration; funding system

(责任校对 唐尧)

①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4 页。

②姜勇、柳佳炜:《论教育研究的中国道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 年第 5 期。